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学术、 传媒与公共性 (第二版)

吕新雨 著

批判传播学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学术、传媒与公共性 (第二版)

吕新雨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传媒与公共性/吕新雨著.--2 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8296-5

I. ①学… II. ①吕… III. ①新闻学—伦理学—研究
IV. ①G21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5395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第二版)

主 编 赵月枝 吕新雨

著 者 吕新雨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璞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296-5/G·11472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纪录片《江村故事》剧照
(吕新雨 导演, 2000年)

“批判传播学”编委

丛书总顾问：童兵

丛书编委（排名不分先后，以中文首字笔划为序）：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

冯建三

吉列尔莫·马斯特里尼（Guillermo Mastrini，阿根廷）

孙皖宁（澳大利亚）

邱林川

林春（英国）

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美国）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英国）

胡正荣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

特里斯当·马特拉（Tristan Mattelart，法国）

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斯洛文尼亚）

童世骏

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资助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反而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做出清理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由于中国问题和传播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与出路的两个重要领域,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同时更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并希冀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与视野中,重新确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近一个世纪前,在1929—193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后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屠杀共产党人、扼杀左派思想的腥风血雨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大写的“批判”一词代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此后,“批判”一词,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内核,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以追求人类解放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学术取向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不愿也无需遮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把本书系定名为“批判传播学”,除了出于文字的简洁性考虑之外,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批判立场,强调我们弘扬以挑战不平等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传播学术的主旨。当然,批判的前提与归宿是建设,批判学术本身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建设性理论实践。在此,我们对传播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任何涉及符号使用的人类意义分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依托的传播技术和知识基础。

本书系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重新检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前提的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中国化的成就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传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挑战,分析当下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媒体、信息与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全球、区域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我们尤其关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播定位和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社会现状,社会正义与批判的生态学视野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产业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城乡分野的互构关系,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和国内维度,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动态历史关系、文化传播权利与全球正义等议题。我们还将挑战横亘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以及“批判传播”与“应用传播”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不但从批判的角度检视与质询那些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传播观念与实践,而且致力于促进与发展那些挑战和变革现有不平等社会传播关系的传播政策、观念与实

践,并进而开拓批判视野下的组织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应用传播领域的研究。最后,我们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论发展与经验研究的批判性运用,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传播情境中更新其批判活力,关注媒介教育、文化赋权和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大众传媒与网络时代的大学、学术与跨国知识流通如何强化或挑战统治性知识权力关系等问题。

本书系包括“批判传播学译丛”、“批判传播学文论”和“批判传播实践”三个系列。“译丛”系列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文论”系列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实践”系列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传播实践者有关自己的传播劳动和传播对象的反思性与传记性著作、以及富有批判性的优秀新闻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和2013年7月成立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是这套书系依托的两家专业机构,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宗旨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推动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成长。

在西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马克思回来了”已然成了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在中国,在这片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就被一代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反复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古老土地上,我们愿以这套书系为平台,为发展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对过去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做出深刻反思,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实践前沿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在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与国内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良性互动,更需要与各种不同的传播研究学派、观点进行真诚对话,彼此砥砺,以共同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以平等与民主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以和平与公正为诉求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是所望焉。

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赵月枝

吕新雨的文集《学术、传媒与公共性》2015年在我们合编的“批判传播学”书系中出版后，现在重版，足以说明此书的吸引力。这部文集主题鲜明，立论清晰，四个部分就学术和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层层推进，各个篇章既交相辉映，也自成体系，无须我赘言，读者就能完全进入新雨学术所构建的丰富知识殿堂。无论是从头到尾细细研读，跟着新雨的编辑思路启程从社会科学基本方法与学术伦理，到具体的纪录片文本分析，这样从普遍到特殊的学术之旅，还是挑自己心中最抢眼的篇章先一睹为快，我相信读者都不但会被新雨学术的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所吸引，而且会被她的学术所体现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所折服。

一

我和新雨之间的交往有非常纯粹的学术性质。2005年初，当我在西方批判知识界的著名思想性刊物《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读到她的《〈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一文时，简直是惊喜之极。虽然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但是，这是一种终于在华人传播学界发现了难得的学术知己的感觉。当时，我不但已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作为孤独的华人学者爬滚了很多年，而且恰好应邀在写一篇有关中国工人阶级传播学的文章。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篇有关改革时代的中国工人阶

级如何没有传播,或者说,他们的传播是如何被“短路”的文章。在我的意识里,这个题目只有像我这样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传播学者才会去写,那个源于美国冷战传播学、在1980年代登陆中国,而后席卷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去阶级化的“沉默的螺旋”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我认为,哪怕跟来自中国的学生张口谈“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都是不合时宜的。

可偏偏在这时,新雨的文章横空出世,使我眼前一亮,让我知道国内传播学界居然还有人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真问题和大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写得如此恢弘、深刻、厚重和史诗般的令人回肠荡气。这样的研究才是无愧于中国人民在被称为“短的二十世纪”革命和建设时代与改革开放,这两个伟大而又悲怆时代的社会实践的传播学术啊!从此,我知道,在做有关中国传播的批判研究方面,有新雨这样一位既有很深的西方批判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视野,又有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学术使命感和专业造诣的学者。

更令我拍案叫绝的是,虽然我自己也做文本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并且一直在倡导与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实践,但是,我总觉得这方面的成果不多。在新雨的这篇文章中,我不仅领略到一位精通西方美学理论的批判文化研究者在文本分析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功底,而且看到了在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问题上宏观政治经济分析和高超文化分析相结合的典范。我有理由相信,这篇现在引领第四部分的文章也许是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唯一一篇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出版的学术文章。

知道《〈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文章之时,也正是我和几位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同仁创立的《全球媒体与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学刊在英国面世的那年。我们的初衷就是推动批判传播学术的发展和传播学术的去西方化,可是,作为新刊物吸引读者的重点文章,推出的几位访谈学者——吉登斯(A. Giddens)、卡斯特(M. Castells)、贝克(U. Beck)、萨森(S. Sassen)——不但全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社会学家,没有一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家。我为自己“发现”了新雨的学术并能把她选为在《全球媒体与传播》推出的一位中国传播学访谈对象而感到无比自豪和自信: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她是一位中国传播领

域的学者，她的问题意识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我眼里，她的研究关注到了中国传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她的分析代表了中国大陆批判传播学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总之，她是我再理想不过的学术访谈对象了。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与新雨见面的情景，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对她的两次访谈。第一次是2007年的冬天，在北大的芍园。当时我在北大客座讲课，她在北京开会。我的客房在阴面，环境有些凄冷，但我们谈得热火朝天，我也用专门为这次访谈买的一支录音笔做了录音。但是，事后发现，我的录音笔上竟然一片空白！等我第二次有机会再做访谈时，已是2008年盛夏，而地点是她在温哥华开会所住的客房。这次访谈的中英文节选版先后出版，而且都有很好的学术反响。本书第二部分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的四万多字文章，是该访谈长版本。

在访谈中，我向新雨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传播的基本问题。这些也正是我自己在研究中一直力图回答的。但是，在这个访谈里，我除了设立访谈话题框架和提供一些基本背景外，主要把自己定位于提问者，而不是对谈者的角色。在这一访谈中，新雨就我所提的有关中国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充分表达了她的思想学术观点，包括在纪录片研究方面的学术道路和学术贡献，几乎每个问题带出来的都是一篇立场鲜明、但没有通常学术文章繁文缛节的浓缩的精彩小论文。而作为访谈者和这篇文章的英文版编译者——这是我第一次为别人做编译——我为自己的学术与新雨的学术之间有如此多的共鸣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新雨举重若轻，在市场、国家、媒体和民主这些重大问题上用三言两语就能把我自己需用整篇文章和整部著作来表达的主要观点说透彻。把时间投在这个访谈上，我不但没有丝毫为人作嫁的感觉，而且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别人从党同伐异的政党政治出发把这个访谈说成“国外那个大左派和国内那个大左派的联合”也好，或则从个人情感的层面同情地把它描述为两位孤独的批判学者间的“惺惺相惜”也罢，我更愿意把这一努力看作是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我相信，这篇经过新雨修订和补充的访谈不但对了解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学术议程，而且对了解新雨的学术历程和学术贡献，包括她的研究在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中的位置，

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判断。虽然我自己忝列国内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一部历史性著作的学者传记中,但是,我注意到,书中没有新雨的贡献。不过,若非要拿这一现象说事,我相信这不是新雨的遗憾,而是中国传播学的遗憾。如果传播学是关于社会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研究的话,那么,正是新雨,不但一直在研究占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体性问题,而且以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共和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工农联盟”为己任;如果中国传播研究应该关注中国“本土问题”,那么也正是新雨一直在强调“乡土中国”的重要性和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之于中国传播学的核心地位;如果传播学只有克服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才能摆脱自娱自乐的尴尬局面而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赢得一席之地,那么,还是新雨不但从一开始就这么做了,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位以她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急迫和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独到见解,而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传播学者。

有点匪夷所思的是,新雨的学术背景是美学,不是新闻学或传播学,她主要关注的传播形式不是最主流的新闻和电视娱乐,而是纪录片——尤其是记录“底层”生活的纪录电影。也许,正是这样的“非主流”学术背景和对“非主流”传播文本和这些文本的创作者的关注,使她不但规避了“主流”传播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社会科学巢穴,而且把自己的学术使命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与体现中国社会根基的“乡土中国”,和代表中国社会最基层和基本的政治概念——人民——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因为这样,新雨的传播学术上(外)承从亚里士多德到德里达的理论,下(内)接重新理解中国农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以及当今社会底层的纪录片的“地气”,而有了批判学术的最重要的“激进”(radical)特质?事实上,正是她的这种“追根刨底”的彻底和纯粹的科学精神,使她从硕士时代对现代中国话剧的研究追到了博士时代对现代戏剧的西方源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研究,从对新闻、影视作品中对农民工的呈现研究进入到中国农民、现代性和城乡关系问题本身的研究,并先后撰写了《乡村与革命》、《乡村与国家》这两部关于中国乡村问题的专著。而正是这样的跨学科或“跨界”的研究,使她对传播问题的分析比一般的传播学者有更深厚和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从而使她的研究有了传播学真正的“跨学科”的

特性。总之，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做学术的路径上，新雨都可以称得上“激进”和“先锋”。

当然，我知道，在去革命和后“文革”的当下中国甚至整个中文语境里，“激进”一词很刺眼，既不和谐也不中庸。但在英文里，radical 有从“根”的层面，也即最基本的根源层面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思。我自己，相信也包括新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批判传播的“激进”本意。如果从贬义的“极端”和“不现实”角度来理解批判传播的“激进”，并把这一特质作为批判传播所独有，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就“极端”和“不现实”而言，追求“真正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才是“激进”的。今天，中国已然开启了“深化改革”并明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时代，新雨的学术道路和学术实践对于我们在理解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学术的“公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反思中国传播研究 3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相对于我向英文学术界展示中国传播学最“拿得出去”的学者，和促进中外传播学术共同体的构建这一动机而产生的直白访谈，作为本书第一部分题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的宏文，无疑是风格迥异的一个文本。在这里，读者需要静下心来，抛弃一些既定框架和对韦伯的现有误读，跟着新雨重新进入韦伯所处的时代和语境来思考社会科学方法，思考何为政治、何为民主以及何为知识分子等重大问题。对于习惯于网络语言和信息快餐的年轻学子来说，这可能是一篇比较晦涩难懂的文章。这不是那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文章，也不是那种上课前半小时匆匆看一眼就能得其要旨的普通学术论文。这是一篇不但需要你头脑比较清醒、心无旁骛反复研读，而且需要你随时准备挑战自己的现有认识，敞开心扉接受其新观点洗礼的文章。但是，对任何一位对学术的意义有所追求的学人来说，这样的洗礼或重新洗礼都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篇文章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传播学术研究上，在总结和反思改革 30 年的成果与缺失的基础上，“再出发”前必修的学术理论和学术伦理功课。

这篇关于韦伯的长文写于2010年10月,而且被新雨当作本书的首篇,我想是非常意味深长和有现实针对性的。它不仅仅是为纪念韦伯逝世90周年而作,而是如新雨自己开宗明义所言,为了“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正是在2010年的春天,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界,更确切地说,在学术和媒体这两个“场”中部分长期集聚的力量互动中,发生了一场由《南方周末》对学者汪晖的所谓“抄袭”问题的人身攻击、道德讨伐,甚至对其进行行政调查的舆论胁迫。对于任何真正关心中国学术和媒体健康发展的人来说,学术共同体的撕裂是如此残酷,一家以“改革先锋”和“专业主义”自居的媒体以如此方式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工具理性,的确令人痛心疾首。然而,新雨不是就事论事——事实上,她的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更没有被当时学界和媒体界的普遍戾气和犬儒之气所绑架,而是以极大的理性和专业性通过“重读韦伯”来谈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何为政治、何为学者和学术为何、新闻为何等问题。对于2010年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对于一个不断在提升社会科学地位和加强公共投入,并希望其在建设中国“软实力”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国家来说,无论如何来评价这篇文章的良苦用心和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建设性贡献都不为过。

当然,在这个官商学媒早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时代,在这个学术伦理和媒体伦理普遍沉沦,在这个学术场和媒体场上语言暴力肆横,在这个“公知”已是骂人的词汇,“教授”被耻笑为“会叫的野兽”,学者和记者可以在北京的朝阳公园门口约架的时代,新雨借韦伯的思想资源正本清源,一边探讨中国现代性道路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一边呼唤重构中国学术共同体和知识分子对自己“天职”的认识,新雨的努力也许是天真的、一厢情愿的,甚至是迂腐的。但是,就像我对一位向我提出同样看法的年轻学人所说的那样,既然我们选择了学者这一职业,既然我们手中只有批判的武器,那么,除了一边精心锻造自己的批判武器,一边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基本伦理,还能有什么别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呢?在这篇文章中,新雨写道:“在韦伯那里,以学术为志业,正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立场。这其实正是韦伯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期许。”在我看来,这何尝不是新雨的“自我描述和自我

期许”呢？

是的，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有把学术仅仅当作权术和赢利手段者，有党同伐异者，也有各种投机取巧者，更有眼睛向上层看的知识分子立场定位——我自己就面对一位博士新生以下真诚的诘问忍俊不禁：“赵老师，你都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为什么还批判？”虽然我的一位访问学者说，最怕我拿学生和访问学者作例子说事，但以下的故事的确让我很有感触：一次，我收到了国内一位素不相识的学者的访学申请，出于学术公共性和这位学者在研究兴趣、所处地域、年龄、性别等方面的代表性考虑，我推荐她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高额访学资助。她来了，第一次与我见面，就以一位受压制和被剥夺者的主体性对我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我问，你和谁比？她说，跟我们领导。我问，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你跟工人农民比过吗？她很坦率地回答道，没比过，这个问题也没想过。

的确，在这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已被“文革”悲情彻底否定的时代，在当年作为对“臭老九”的矫正和补赎而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面政治定位早已被遗忘和抛弃的今天，在这个不是主动就是被逼去西方访学的中国学者（月初回国讲学，知道国内一所地方性普通大学的新规定：没有在国外一年以上的访学经历，就不能提正高级职称）可能比到中国的工厂农村做田野研究的学者多的时代，谈学者的“天职”近乎奢侈，而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又怕要被扣“回到文革”高帽。但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之所以还被社会认为是一种值得投入和关注的事，我们之所以还能吸引除了把学术当作进入中产阶级的阶梯、把导师当“老板”的异化学术劳动之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子，不正是因为还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坚守韦伯意义上学人的“天职”吗？而且，当一位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使学生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发现自我，确立自己的学术伦理，不再做自我异化的学术，并对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所占有的话语权有超越自我认识的时候，他们不是为学术共同体注入了一份新的“正能量”吗？

三

新雨所实践的正是她所描述的那种在韦伯意义上既“客观”、“专业”

又立场和价值鲜明,以人民利益和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学术。在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的篇章中,她以学术视野,以丰富的世界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理解为背景,娴熟地调用各种理论资源,以精到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激扬的文字就种种影视传播文本和传播现象进行了精彩分析和富有建设性的批判。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无论是对中央电视台2002年、2006年这两台春节晚会鞭辟入里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还是对建立“公益电视台”的改革尝试所做的开放和审慎的评析,或是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所展开对媒体公共性的社会政治基础的分析,新雨无不以学术的公共性为依托来为中国媒体的公共性寻找理论和道义的基础、媒体制度和政策的支撑、社会阶层的依托,以及在具体媒体实践中实现的途径。在这一努力中,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珍视和正视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许诺和历史性实践,反对浅薄的“国家对社会”二元论框架,批判把市场等同于自由和民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并毫不讳言“锻造国家的左手”的正当性和迫切性。她没有盲从西方教条和任何历史目的论,更没有像我们的访谈中所批判的那样:去历史化和去阶级化地生搬硬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她不但把中国媒体的“公共性”作为一个历史的和具体的“社会过程”来看,而且注意到国家内部的公共性立场空间和媒体人对这种立场之坚持的可能性:“国家并不是别人的,国家属于人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社会主义的承诺。国家需要我们去锻造,其空间需要我们去争取,民主需要一个在国家内部争取,需要锻造国家权力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社会意识的保护。这种锻造需要我们去践行,需要中国的媒体去奋斗。”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新雨主要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国家曾经的“主人们”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呈现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复杂和多面的,甚至充满冲突的,这些影像作品和这些影像内外的人们——包括作为学者的新雨自己,都在这样的冲突中。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把每一个体都深深地嵌入阶级、性别、种族、国家、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这些社会关系中。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后,中国社会在阶级和性别等社会关系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由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现实正是学术和媒体的“公共性”问题得以展开的场域。